

标出性翻转：阿来小说的文化符号政治学

谭光辉

一、什么是标出性

“标出性”是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术语，其理论来源是语言学中的“标记性”，但是由于译为“标记性”不能显示其原意中的被动态（markedness），所以赵毅衡建议将其译为“标出性”。这一术语是特鲁别茨柯伊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广泛地应用于语言学。特鲁别茨柯伊发现在语言中，二元对立的清浊辅音出现的频率有相当清晰的不对称现象，浊辅音因为在发音过程中多了一项运动而相对困难，所以使用频率相对较少，被标出。现代搜索引擎的强大搜索功能印证了特氏的判断，几乎在所有语言中，清辅音的使用频率都要高于浊辅音。进而，赵毅衡作出一个大胆的判断：在文化符号学中，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不对称的，必然有一项被标出，成为标出项。

在用标出性理论审视文化符号的时候，赵毅衡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规律。第一，在文化符号学中，所有二元都是三元，导致不平衡的因素是“中项”。“标出项之所以成为标出项，就是因为被中项与正项联合排拒。”这种现象叫做“中项偏边”，“是文化符号中判断标出性的关键”^①。第二，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无数次的“中项偏边”造成标出项的翻转，这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标出性翻转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上的认知变化的结构模式和原因，是一种具有通用性的基本原理，例如可以用来解释政治上的“团结大多数”原则，用来解释另类艺术、先锋艺术如何成为正统艺术的问题，在人类学上解释性别政治的问题，等等。

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往往表现在异项在中项的支持下变成正项，而正项则变成了异项。在标出性翻转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正项的阵痛、异项的狂欢与中项的艰难判断。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处于原理规则之内的主体却无法避免情感的冲击，冰冷的法则遮蔽不了心灵的热情，控制人间悲欢离合的，也许就是那只规则的巨手。

阿来虽然不是符号学家，但是他写的小说故事基本上都是在呈现和解释这一原则。本文着重讨论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阿来小说如何完美地参与了标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5页。

出性翻转问题的形象阐释，二是在标出性翻转过程中，正项如何经历阵痛而最终被改造的问题。

二、《尘埃落定》中的标出性翻转

在文化符号学中，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三元。以《尘埃落定》为例，该小说所涉的最重要的二元对立项是智与愚。事实上，这二项之间还有第三项，那就是既智又愚或非智非愚。与人物相关联来看，有聪明人、傻子、普通人。在小说前半段，聪明人是正项，傻子是小说的叙述者兼主人公二少爷，因为叙述者视角在异项，所以本阶段暂缺中项。正项是在二项对立中使用较多的一项，异项是出现较少的一项。《尘埃落定》在开场时只存在一个傻子，在他看来，其他所有人都是聪明人，所以最初的异项是被孤立的。在傻子看来，连狗都是聪明的，它们要在证实了奶娘的气味之后再接受她的施食。土司有一个儿子是傻子，方圆几百里的人就都知道了，他的地位让他具有名气，他的名气让他成为不折不扣的异项：其他所有人都是聪明人，傻子的存在独一无二。

智与愚的对立，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智商的数字问题，但是在文化符号学中，它并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智与愚到底谁是正项谁是异项依赖中项的认定。当全域缺少中项的时候，正项与异项的认定靠的是数量的多少，比如，因为只有一个傻子，所以傻子就必定是异项。当全域中存在中项的时候，正项与异项的决定者在于中项。中项认同哪一边，哪一边就是正项。所以，智与愚的翻转，必须等待中项的出现。中项的出现，必须等待正项将自己从中项中分离出来。在《尘埃落定》中，中项的出现时刻就是聪明人自己跳出来，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别开来的时候。第一个自己跳出来的聪明人，是麦其土司太太，傻子的母亲。傻子与奴隶们玩耍，土司太太不高兴，“摸摸我的脑袋，说：‘儿子啊，你要记住，你可以把他们当马骑，当狗打，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她觉得自己非常聪明，但我觉得聪明人也有很愚蠢的地方”^①。第二个被描写的“聪明人”是麦其土司。麦其土司喜欢更多自由的百姓变成没有自由的家奴，“而且，要使自由人不断地变成奴隶那也十分简单，只要针对人类容易犯下的错误订立一些规矩就可以了。这比那些有经验的猎人设下的陷阱还要十拿九稳”。按照小说的表述，土司家庭中，除了众人皆知的傻子之外，其他人都慢慢地将自己定位为“聪明人”，逐渐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傻子同父异母的哥哥也自认为是聪明人，在与汪波士司的战斗中成为“英雄”，逐渐与普通人隔离开来。麦其家就由三个聪明人和一个傻子组成，无论从数量还是认同度上看，傻子都是异项。但是随着正项权力的上升，中项就逐渐产生了。土司与下人的对立，是在权力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土司不容许任何下人有任何超过自己的表现，他们不容许别人比自己更聪明、更勇敢、更富有，甚至不能容许别人有一个美丽的女人。麦其土司杀死了对自己无比忠诚的头人查查，霸占了他的女人和财产，根本原因就是土司看上了查查美丽的妻子央宗。当然，正项在将自己塑造为绝对

^① 阿来：《阿来文集·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2页。下面的引文均出自该书，只在行文过程中标注页码。

正项的时候,也就逐渐脱离了多数,中项就被制造出来了。例如傻子的哥哥的弱点是“特别怕自己偶尔表现得不够聪明”,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希望在众人中突出。所以,中项不是自动产生的,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产生于正项对多数的脱离,是正项生产了中项。

在《尘埃落定》中,最初在傻子眼中是没有中项的,其他所有人都是聪明人。随着故事的展开,一批自认为“聪明”的人开始出现,使中项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中项偏边,总有一定的原因,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偏向正项或者偏向异项。中项总认同正项,或者说,中项偏向于哪一边,哪一边就是正项。中项认同的基本原则是利益原则,谁能给中项带来利益,中项就会倾向于认同哪一边。作为麦其家的家奴或百姓的中项,最初不会偏向于认同傻子,因为傻子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的好处和利益,所以在一个常态的世界,傻子就是傻子。

局势的变化改变了一切。饥荒之年到来,麦其土司要对两个儿子进行考验,看看到底谁聪明谁傻。首先麦其土司在南北边境各修粮仓一个,让兄弟二人各守一座。两兄弟的策略截然不同。哥哥好战,自认为聪明神武,与汪波土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战斗,仗着己方武器先进,追汪波土司于其领地内部,一无所获,却被汪波土司逐渐吃掉现代化的装备,并于后方袭击其粮仓,武器粮食尽失,不但领地未增分毫,而且输得一败涂地。哥哥的失败原因,是将自己绝对正项化,离开了中项的支持,在时代进步与变化面前主动将自己变成了异项。傻子与哥哥完全相反,他首先没有将自己与中项隔离开来,而是把正项抛离出来的中项团结了过来。在北方边境,傻子先让自视为聪明人来讨粮的拉雪巴士司空手而归,再让茸贡土司吃了闭门羹,此为孤立正项。其次,他拆掉了象征隔离正项与中项的堡垒围墙,施舍食物给走投无路的拉雪巴士司的百姓。百姓杀死头人,背叛拉雪巴士司投靠傻子。至此,傻子得到了中项的支持成为正项。而曾经的正项又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如拉雪巴士司和茸贡土司那样成为傻子的支持者,一种是像哥哥那样成为异项。至此,正项与异项彻底翻转。“傻子,这个词在短短的时间里,被我赋予了新的,广泛的意义。现在,这个词和命运啦,福气啦,天命啦,这些词变成了同样的意思。”

赵毅衡认为,在文化符号学中,正项与异项的稳定关系必须遵循如下几条基本原则:必须划出少数异项,必须边缘化异项,必须容忍异项。傻子在北方边境的作为,完全符合这三条原则。首先,团结大多数,让异项永远只是少数存在。先孤立傲慢的拉雪巴士司,让茸贡土司拿着机枪子弹打得拉雪巴士司溃不成军;然后团结拉雪巴士司,让自以为是的茸贡土司被拉雪巴士司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主动将美丽的女儿塔娜嫁给傻子当老婆;最后建立自由贸易市场,让大家成为利益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异项永远保持少数,这两个土司不能同时成为异项,方法是傻子自己成为中项偏向于其中一边;其次,异项必须被边缘化和孤立,拉雪巴士司被叛离自己的百姓、茸贡土司孤立;最后是对异项的容忍,异项成为贸易伙伴,连与哥哥连连交战的汪波土司,也绕很远的道来与傻子做生意了。在新的平衡达成之后,唯一剩下的,是仍然自以为是的哥哥。哥哥的存在对新的平衡仍然是重要的,他是最后的异项,是平衡存在的必需,而且必须边缘化和容忍他的存在。

小而论之,《尘埃落定》中傻子的文化符号政治学是一种关于人类的本能意识的政治哲学。之所以只有傻子才深刻地领悟与掌握了这一原则,是因为傻子只会从现象判断、本能反应的角度思考问题,“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哥哥之所以自视聪明而终于化身为异项,是因为他的好胜、贪婪、自我表现,违反了人的生命本能,从而违反了文化符号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大而言之,整个土司制度的存在也是如此。在土司统治期间,不容许异项存在,必然导致不平衡。不容许异项存在的结果是产生了复仇者。麦其土司利用多吉次仁杀死了其主人查查,又杀死了多吉次仁,其子多吉罗布多年后回来复仇,成为麦其土司和哥哥的巨大安全威胁。小说的结尾,仇人杀死了他本不想杀死的傻子,傻子欣然接受了命运,终于尘埃落定,最后一个土司的象征被异项杀死,完成了一次异项翻转的平衡。但是异项翻转必须借助强大外力的进入。土司制度必然土崩瓦解,不是因为复仇者,而是因为“红色汉人”的到来。在土司统治期间,土司以其权威性成为正项,大多数贫民成为异项,然而这是不正常的。“红色汉人”到来之后,这一切就完全翻转过来。在土司制度时期存在的正项异项翻转之后,新的异项又会被重新标出,对这个现象的叙述,留给了《空山》。

三、《空山》中的标出性翻转

《空山》讲述了新政权建立之后的社会变化,但是如果逐一加以考察,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文化标出项的翻转。《随风飘散》讲的是异项的必需和在一个没有外来强大文明进入的状态下翻转的不可能。在机村这个封闭的小山村中,异乡人、私生子及其母亲、孤儿寡母格拉母子被机村人视为异项。因为第一条规律,一个社会必须划出少数异项,所以格拉母子就因为身份问题而必然成为异项。作为异项的格拉,不可能被机村人完全接受,因为一旦他们接受了异项,就会因为失去异项而去寻找新的异项。被边缘化的格拉必须承担一切加在他身上的冤屈,所有人都说是他炸伤了兔子,逼迫这对母子离开了机村。异项消失之后,机村人感到无比的失落,原来的生活失去了平衡。因为必须有新的异项,所以恩波被机村人视为异项,大家说是他逼走了这对母子。就在恩波无比绝望的时候,格拉母子回来了。机村人向这对母子表达了友好和善意。阿来的高明处,在于他并没有让诽谤终止,而是让格拉仍然做异项,机村人仍然一如既往地说是格拉炸伤了兔子。任何一个社会,必须有少数人承担公众的罪恶。兔子死了,所有的罪责都推在了格拉身上,没有人听他的申辩。格拉逃入林中,生活了好几年,认为仇恨已消失,这才回到村庄。阿来最高明的地方,在故事的结尾:当格拉要回村看母亲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魂魄。意思就是说,一个社会必须有异项来承担社会的恶,如果社会中实在找不到异项,社会也要虚构一个异项来承担。社会必须有仇恨,即使仇恨的对象是鬼魂。当然,社会一般会选择弱者作为异项,机村人就选择了一对孤儿寡母。选择弱者作异项,保证了异项翻转的不可能。

《天火》讲的是不容忍异项的恶果。新政权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宣布自己是正项,普通人是中项,但中项也被宣布为正项。但是社会必须划出异项,所以放火烧荒的巫师多吉就成了异项。林业派出所的老魏遵守了必须容忍异项的原则,每次都多吉关一段

时间又放出去,多吉照样每年烧荒,以保证牧民们有丰盛的水草。但是这一年情况变了,连老魏也因“包庇”多吉而被造反派抓了起来,多吉被宣布处以死刑。一个社会,如果采取消灭异项的办法,是无法维持的,这是《天火》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漫天大火烧起来了,除了多吉,机村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处理。造反派倾心于开会搞阶级斗争,机村人面临着覆灭的威胁。最后,森林消失了,保佑机村的色嫫错消失了,消灭异项的行为得到了上天的报复。

《空山》在文化符号政治学上的重要贡献,还不止于上述原理的揭示,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讲述了生态主义视野下的文化符号政治学原理。它试图告诉我们,有一个符合自然生态的正项与异项的基本对应关系,正项与异项互为存在前提。在《达瑟与达戈》中,作者用了最多的篇幅讲述格桑旺堆与他的熊的故事。若把猎人看作正项,猎物就是异项。然而一旦猎物没有被猎人捕获,猎物反而成为英雄,猎人就只能把猎物看作自己的宿命。正项与异项翻转了,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衡。这暗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平衡关系:自然生态的文化符号学,始终坚持在正项与异项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异项可以翻转,但是正项不会彻底消灭异项。消灭异项的同时,正项也会随之被消灭,就如格桑旺堆的熊与达戈同时消亡一样。然而人类却往往不遵循这个原则行事,最终破坏了这种平衡关系。《达瑟与达戈》中的其他几条线索,也是猎人与猎物的关系,只不过换了主人公和猎取的内容,结果被换成了不平衡的关系而已。例如达戈与美嗓子色嫫的关系,也可看作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只不过,猎人达戈成了猎物。在这场对决中,猎人与猎物没有谁胜出。达戈与抓捕者的关系、人与猴子的关系均是如此。如果有一方胜出,必然破坏平衡,招来灾难。最后的猎人达戈死了,象征文化符号政治学的原理也变了,消灭异项的政治学盛行,现代化的病症一步一步显现出来。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不是正项与异项的关系,而是和谐与平衡的关系。一旦人从中突出,将自己变成正项,自然就成为人类的异项。人类毫无节制地对自然索取、破坏,消灭了自然,最终也就消灭了人类自身。《荒芜》《轻雷》《空山》讲述的是机村在现代化压力之下的变化。现代化的最大压力,是对经济利益的无止境的追逐。对森林的滥砍滥伐,始于国营木材厂。砍伐造成汉人与藏民之间的不断冲突,但是事情并未终止。改革开放后,藏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更加毫无节制地砍伐森林,耗尽了子孙后代的财富。现代化的结果是把“富”变成了正项,把“穷”视为异项,要使人类自己不成为异项,就要把自然看作异项,自然就在人的手里被消灭了。这之后,富裕又有了新的认证方式,原来的经济渠道被破坏了,新的旅游业兴旺了,对远古时代的怀念成了赚钱的新渠道。到机村来的人,满怀敬意地怀念着曾经的生活方式,虽然这个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但是它仍然有一些古老的残存。为什么机村会成为旅游胜地呢?这又必须谈到文化符号学中的另一个问题,即文化符号学中的艺术原则问题。

政治学以稳定为要。艺术则相反,以颠覆庸常凡俗符号为要。艺术冲动是对凡俗符号优势的反抗,人有成为异项的潜在冲动。赵毅衡认为,在后现代文化中,异项艺术占多数,艺术越来越倾向于异项。换句话说,后现代审美一直倾向于表现标出项、异项。游客对机村的观看,是审美化的观看,说明机村在后现代社会中被标出为异项,正项是一个发达的现代化的社会。成为异项,在一个审美的现代社会中并不失为一件好事,人

在这个社会中艺术化地生存，是新的平衡达成之后对异项的容忍，保证了异项的存在。

从整体上看，机村经历了一个从正项变成异项的过程，又正在经历从异项变成正项的翻转。当机村还处于原始自然的生活状态中的时候，蓝工装的伐木工人在机村人眼中是异项；改革开放之后，靠倒卖木材赚钱致富者逐渐成为正项，固守原始生活的人逐渐成为异项；在现代社会，机村成为旅游胜地，在城里人眼里是异项。不难设想，当现代人饱受现代化病症困扰而向往返璞归真的生活的时候，机村又会逐渐变成社会中的正项。标出项的翻转，在机村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演绎，这种翻转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缩影和显现。

四、标出性翻转过程中标出项的阵痛

阿来的小说不但是对文化符号政治学的形象阐释，还深刻地指出标出项必然经历的阵痛。因此，阿来小说就不仅仅是文化符号政治学的教科书，更附着了深广的情感内涵和人生内涵。

以《尘埃落定》为例，起先傻子是异项，傻子也乐于成为异项。这说明异项在通常情况下乐于保持异项身份，因为异项身份反而是保护自身的重要手段，使他不至于因为被认为过于聪明而招来迫害。正是因为每个社会都需要异项，所以在正常的社会中，乐于成为这个社会的异项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一种异项身份可以遮蔽另外一些敏感的异项身份。当我们以“智”与“愚”的二元对立思维考虑傻子的时候，他在权力上成为哥哥竞争者的可能性就小了。重要的不在这里，小说着重表现了标出项翻转过程中正项翻转为异项的痛苦。哥哥在朦胧意识到傻子不傻而是绝顶聪明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恐惧，感到自己作为土司继承者的可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与挑战，事实上是感到了将要沦为异项的痛苦，所以才对傻子是真傻或假傻无比关注。麦其土司对逃走的仇人的儿子也极为关注，因为这个异项极有可能翻转，让自己成为仇恨所涉的二元中的异项。当土司制度消亡的时候，仇人杀死了土司家庭最后一个象征，异项翻转时的苦难由傻子一个人承担下来。

《空山》中着力表现的，也是异项翻转时的痛苦。当格拉离开村子之后，村里每个人都感觉到了有可能成为新的异项的恐惧，所以才会有让格拉母子返回村子的强烈愿望。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之后，凡是反对新的正项的人都成为异项。机村人对新社会中的许多行为不能理解，也不乐于支持，就成为异项。成为异项的机村人，忍受着灵魂的痛苦。甚至每一种新事物的到来，都会伴随这种因正项翻转成为异项而生的痛苦。现代化的机器进入机村之后，“这些新事物在给机村人带来惊奇、兴奋、高效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到不安、惶惑和伤痛”^①。现代化的强大压力不仅使时代的转型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是机村人内心深处不可改变的渴望。然而改变之后的机村人，又无比怀念当年的生活方式。当年的生活，没有外界环境的对比，在平衡中自足自乐，如今在现代化压力

^① 邵燕君：《“纯文学”方法与史诗叙述的困境——以阿来〈空山〉为例》，《新世纪文学脉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页。

的捆绑下,机村人经历了沦为异项的痛苦,然后又享受了升为正项的欢乐。机村人的喜怒哀乐,就在这种标出性翻转的过程中被规则左右。“文化的发展,就是标出性变化的历史。”^①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就是阶级、群体的喜怒哀乐主体变化的历史。历史学家致力于梳理历史的演变,文学家则关心其中的人情冷暖与情感变迁。阿来以其敏锐的感觉捕捉到历史剧变过程中机村人的情感变迁,并以此映射出一只左右人类情感变迁的文化巨手。

在文化符号的标出性翻转的游戏过程中,情感的悲喜剧在一幕幕上演。换句话说,人类的情感变化无时无刻不是在映现标出性翻转过程中的沉重划痕。文化符号学并不关心情感与心理的变化,但是政治学却不得不关心它。西方现代政治学研究“一度有政治学就是心理学的说法”^②,因而文化符号政治学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关注人类心灵的变化,不得不依赖于心灵的分析从而得出政治、权力变化的心理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必然是一部文化符号政治学的形象演绎;任何一次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演变,都必然遵循标出性翻转的普遍规律;任何一个关心文化变迁的文学家,都不得不将目光聚焦于标出项的翻转及翻转过程中正项与异项的心灵阵痛。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②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